

中国现代史论·第七卷

薛庆超 著

邓小平第一次 主持中央工作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史论·第七卷

薛庆超 著

邓小平第一次 主持中央工作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史论. 第7卷, 邓小平第一次主持中央
工作/薛庆超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220-08095-1

I. ①中… II. ①薛… III. ①中国—现代史—史料
IV. ①K260.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5181 号

ZHONGGUO XIANDAI SHILUN

中国现代史论·第七卷

邓小平第一次主持中央工作

薛庆超 著

策划组稿	刘周远 李洪烈
责任编辑	李洪烈
封面设计	邹小工 王泉语
技术设计	戴雨虹
责任校对	袁晓红
责任印制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459 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5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0.5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08095-1
定 价	36.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总 序

一、关于中国现代史的起点问题

中国古代典籍《左传》中曾经写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对立德、立功、立言作了注疏。他指出：“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世；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中华民族，创业维艰，筚路蓝缕，雄踞东方。古往今来，世事交替，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而唯一不变的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高度重视与传承：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一部中国历史，记载了中国五千年以上有文字可考的辉煌，浓缩了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绵延不绝的文明。中国古代史，先人创业，开拓封疆，创造了疆域辽阔、生生不息的东方大国。中国近代史，由盛而衰，血泪交织，记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耻辱。中国现代史，地覆天翻，人间巨变，记载着中华民族奋起抗争、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壮丽史诗。

关于中国现代史，有多种不同的分期：

一是以 1919 年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其主要根据是，在五四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以此为标志结束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由此从近代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也由此开始了中国现代史。

二是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其主要根据



是,1919年至1949年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其目标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虽然革命性质发生了变化,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革命对象、革命任务、革命目标仍然没有改变。而且,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一直没有改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中国现代史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开端。

三是把中国近现代史联系在一起,以1840年中国人民反抗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而爆发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开端。这样,把整个中国社会由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全部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一种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方法。

四是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从中国现代史中划分出来,称之为“中国当代史”、“当代中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建立了当代中国研究所(以后划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序列),专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历史。

其实,关于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与分期,不论哪种划分方法,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均可成立,接受史学界和社会的检验。凡是史学界和社会认可的划分方法,就可以作为大家公认的划分方法;凡是史学界和社会不太公认的划分方法,则可以作为一家之言。

《中国现代史论》采用了以1919年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因为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划分方法。

二、关于《中国现代史论》的若干问题

人类对于浩瀚宇宙的认识永远是一个过程,新的认识、新的发现、新的探索总是层出不穷。

人类对于历史科学的认识没有终极真理。因为新的史料、新的发现、新的认识、新的观点、新的思想,总是在不断地出现,并由此推动着历史科学不断发展,永远不可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中国现代史论》就是在前人开拓的基础上,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作者对中国现代史上一系列问题深入探索的结果。这些问题包括:

中共中央在长征中的一系列重大决策……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过程与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从战略进攻到夺取全国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发展与巩固……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爆发与十年内乱……

林彪为何成为“接班人”？林彪集团的形成、崛起与覆灭……

江青集团的形成、崛起、衰落与覆灭……

王洪文成为接班人的历史真相、“王洪文现象”的历史原因、王洪文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历史必然性……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反对江青集团的斗争……

中共中央决策粉碎“四人帮”的详细过程与具体实施细节……

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三落三起”的历史内情……

当代中国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的缘起、发展与评价……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政治局会议实现当代中国历史性转折的过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彭德怀、陶铸、刘少奇等一系列重大冤假错案平反的重大史实……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造中华民族伟大振兴历史辉煌的历程、成就与经验……

三、关于《中国现代史论》的视角与特点

实事求是，古已有之。贵在坚持。贵在发展。贵在创新。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赋予了实事求是以新的内涵，首先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进而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全体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的重要思想指南。

邓小平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赋予了实事求是以丰富的思想内涵、理论内涵和崭新的时代精神。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中国现代史论》总结、整合了作者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研究心得和研究体会，对中国现代史上若干重要历史、重要人物、重要史实的来龙去脉、理论与实践、探索与结果、曲折与辉煌进行了一些分析与评说。其主要特点是，始终不渝的坚持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第一，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历史研究。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都是建立在历史科学基础上的。只有研究、发现并正确的解说了历史发展规律，才能奠定阐述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社会主义体系的坚实基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就要用辩证的思维，科学的态度，准确的史实，严谨的方法，多角度的视角，多侧面的视野，与时俱进的观点，实事求是的恢复历史本原，找出对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达到还原历史、发现规律，资政育人、开拓创新、开创未来的目的。

第二，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历史。研究历史、反映历史、复原历史、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就必须摒弃对于历史的所有伪造、篡改、曲解、戏说和捏造。例如，“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迅速从华南上升到中央，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很快晋升为中央的第四号人物；然后，又很快被打成“党内第三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打倒。对此，人们一直如坠云雾，弄不明白。《中国现代史论》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陶铸上升与被打倒的真相。为了说明问题，专门以一定篇幅引用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使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

第三，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历史上的争议问题。对此，要坚持以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重大史实目击者的回忆为基本依据。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真实情况，《中国现代史论》翔实地反映了天安门事件中，北京广大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深情悼念周恩来、坚决拥护邓小平、愤怒反对“四人帮”的真实历史场景。同时，也详细引用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兼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吴德的回忆，从吴德的角度说明了天安门事件的起因、发展、高潮与被江青集团镇压的情况。两相对照，天安门事件的伟大历史意义便可以非常清晰地展现出来——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前进；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第四，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历史人物。东汉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说过，对于历史人物研究，要做到：好人“不溢其美”，坏人“不增其恶”。历史人物，由于所处的历史时期、历史环境、客观条件、主观原因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不可能尽善尽美，不可能完美无缺，在写历史的时候，都要真实对待，真实反映。《中国现代史论》在评价华国锋时，就对具有多方面的不同

形象的华国锋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在全国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他是一位从革命青年一级一级逐步成长起来的县委书记，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兢兢业业，踏踏实实，老实本分，联系群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十年内乱时期，华国锋相继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业务组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代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毛泽东逝世后，他主持了粉碎江青集团的斗争。在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后，既有历史功绩，也有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对于这样的历史人物，既要充分肯定其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粉碎江青集团的重大贡献，又要实事求是地指出其坚持过“两个凡是”的错误，不能因为肯定其某一方面而肯定其一切方面，也不因为否定其某一方面而否定其全部方面。

第五，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重大历史事件。掩盖在重大历史事件上空的种种迷雾，造就了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往往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虚构，甚至伪造。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进行详尽的考证，力求通过翔实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弄清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结束的前因后果与来龙去脉。《中国现代史论》对于粉碎江青集团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动因、中国人民的意志、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精心部署、粉碎江青集团的具体过程，进行了历史考察，展示出一幅真实的历史场景，把历史的真实还原给历史、还原给人民、还原给读者。使人读后，惊心动魄，回肠荡气，进一步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历史主动精神”和重要作用，重要人物在历史发展关键时刻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第六，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重大历史疑难问题。《中国现代史论》对至今在中国和世界上还存有争议的一些重大历史疑难问题进行了解释、答疑。以消除疑问，揭示真相，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中国现代史论》对于林彪事件，就进行了这方面的澄清，给予了令人信服的回答。林彪事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因为林彪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而点燃的大火早已熄灭。但是，各种说法却一直没有停息过。而且，往往“假说”比真实更生动、更具体、更能吸引人、更有传播空间。于是，关于林彪死亡的“中国导弹击落说”、“苏联驻蒙古军队导弹击落说”、“玉泉山说”、“林立果绑架林彪说”等等，一直在中



国、外国流传着。《中国现代史论》以权威的历史当事人回忆、苏联历史当事人回忆，缜密考证，翔实研究，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国政府关于林彪事件公布的史实都是正确的、确凿无疑的。一些“流行的最新说法”大都属于“推测”、“设想”、“主观臆断”，并没有任何历史证据作为根据，因此是站不住脚的。

总之，坚持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就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就要用实事求是的精神，辩证的、历史的、全面的对待历史；就要用辩证的逻辑、发展的思维，思考历史问题、看待历史问题；就要用历史的智慧和时代的眼光，评价历史人物、评述历史真相；而绝不能以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僵化的、一成不变的观点研究历史、评价历史人物、评述历史。

在这方面，《中国现代史论》仅仅是一个开端、一种尝试、一块“铺路石”……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中国现代史论》的唯一标准……

作 者

2010 年春天

目 录

第一章 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001
第二章 毛泽东在长沙、杭州·····	013
第三章 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026
第四章 中央政治局批评“四人帮”·····	035
第五章 提出“三项指示为纲”·····	045
第六章 钢铁工业整顿初见成效·····	058
第七章 整顿国防工业的重要举措·····	070
第八章 “各方面都要整顿”·····	076
第九章 “敢”字当头 反对“派性”·····	084
第十章 增强党性 知难而进·····	093
第十一章 解决“老大难”省、市的问题·····	103
第十二章 “要给贺龙同志平反”·····	113
第十三章 全面整顿 铁路先行·····	125
第十四章 科技整顿 震撼人心·····	132
第十五章 上将上台 人心大快·····	150
第十六章 批驳谬论 恢复教育·····	165
第十七章 最高法院 正本清源·····	169
第十八章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176
第十九章 两位军委副主席部署整顿军队·····	184
第二十章 调整军队各大单位领导干部·····	196
第二十一章 整理《论十大关系》·····	205
第二十二章 《李双双》、《创业》、《海霞》、《李自成》·····	212



第二十三章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226
第二十四章	全面阐述“三项指示为纲”	234
第二十五章	毛泽东深夜评《水浒》	239
第二十六章	江青集团发动“评《水浒》”运动	245
第二十七章	周恩来廓清“伍豪事件”真相	255
第二十八章	毛泽东怒斥江青的“大寨讲话”	265
第二十九章	全面整顿受到非议	270
第三十章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上书毛泽东	276
第三十一章	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286
第三十二章	中华大地出现新的“内乱”	293
第三十三章	1975 年全面整顿的历史地位	302
后 记		310

第一章

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975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10个年头。这场名为“文化大革命”、实为“政治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十年内乱”的运动，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广大干部群众普遍迫切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因此，在围绕着动乱与反动乱、篡权与反篡权、整顿与反整顿展开的更加激烈的斗争中，党内以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力量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帮派势力进行了更加尖锐的斗争。

早在中共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为此，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是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同时要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他们在各种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高级领导干部，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的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对周恩来“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工作，批判林彪集团的极左时恢复“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正确的政策措施和落实干部政策进行攻击。“四人帮”在各地的帮派分子在各地揪斗老干部和知名人士，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造成政治形势与社会秩序再度混乱，刚刚有所好转的国民经济再遭严重破坏。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此局面痛心疾首，渴望扭转危局，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搞乱全国的图谋有所察觉，对



“批林批孔”运动作出限制性规定，并在中央领导层提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的问题。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四人帮”再次搞乱全国的图谋受到抑制。同年10月，中央发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的通知。“四人帮”认为这是篡夺更多权力的机会，加紧阴谋活动，企图出面“组阁”，遭到惨败。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1974年10月，中共中央向全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均重病在身，年老体弱，因此，他们把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

邓小平早年投身革命，在欧洲勤工俭学，经历过资本主义大生产；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了解苏联式社会主义的长处和不足；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曾经长期担任一个大战略区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整整10年。文能治国，武能安邦。“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被打成“中国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批判，流放江西。历史经过一段曲折发展以后，毛泽东对邓小平重新表示信任。1973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在同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邓小平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同叶剑英一起，提议请邓小平参加中央政治局任政治局委员，同时参加中央军委任军委委员、总参谋长。1974年12月，正在湖南长沙养病的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名次在其他副总理之前）、总参谋长。毛泽东给予邓小平以很高的评价。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

1975年，中国现代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终于来到了。

1月1日，周恩来同邓小平和李先念谈话。同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邓小平代表中央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

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

1月3日，周恩来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十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及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等问题。

1月4日，周恩来和王洪文联名向毛泽东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并送去讨论通过的人事安排方案。

根据毛泽东在长沙的决策，经过周恩来的精心运筹，依靠党和人民的力量，“众志成城”，中共中央政治局挫败了“四人帮”妄图阻挠中央任命邓小平担任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的图谋。

1975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于1月5日发出1号文件，通知全党，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这标志着毛泽东把对400万人民解放军的统率权交给了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特殊时期，毛泽东选择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意义深远，非同寻常。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历来都被视为是十分重要的职务，在全党、全军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任总参谋长是徐向前，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一位在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功勋卓著的名将。

第二任是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曾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德才兼备，军政皆优。

第三任总参谋长是彭德怀（对外未公开），曾任红五军军长、红三军团军团长、八路军副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是人民军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第四任总参谋长是粟裕，在坚持南方红色游击战争和新四军华中抗战中皆为著名指挥员。其过人的文韬武略，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东战场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他筹划了一系列重大的战役、战斗，其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第五任总参谋长是黄克诚，曾任红三军团师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兵团司令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总后勤部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素以深谋远虑、办事沉稳、



坚持原则、大公无私、勇于直言。

第六任总参谋长是罗瑞卿，曾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长、红一方面军保卫局长、抗大副校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公安部长等职务。精力充沛，办事干练，勇于负责，雷厉风行。

第七任代总参谋长是杨成武，长征中率“开路先锋红四团”斩关夺隘，一往无前。抗战中率部坚持华北抗战，曾大战黄土岭，毙敌酋“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解放战争中在华北战场东征西杀，屡建功勋。

第八任总参谋长是黄永胜，参加过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和井冈山的斗争，从广州军区司令员的位置提拔上来后，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九一三”事件后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

第九任总参谋长是叶剑英（对外未公开），曾参与领导广州起义，长期担任红军、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中共十大以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以上九任总参谋长中，共有四位元帅、三位大将、两位上将。

邓小平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十任总参谋长，同时又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三位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总参谋部工作的总参谋长，第二位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总参谋部工作的总参谋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特殊时期，毛泽东选择由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确实意义深远，非同寻常。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因在长沙养病，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研究四届人大准备工作的会议。全会讨论了关于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成员与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四届人大讨论。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标志着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邓小平在离开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8年多之后，不仅重新成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而且从原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上升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将发挥更大的影响和更加重要的作用。全会还批准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要求。会议期间，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1975年1月13日到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自1964年12月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整整10年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一位当时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回忆说：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一次秘密会议，事前没有公布会议召开的消息，会议的各项活动也是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只在会后各新闻单位才予以公布。这是前所未有的。

大会的代表预先接到了将要出席大会的通知，但何时出发却不知道，通知的人只强调要严守秘密，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不能告知。1月2日，被送上去北京的军用飞机。经过几小时的飞行，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抵达北京南苑军用机场，然后又转乘军用汽车去下榻的饭店。车上的工作人员早已把窗帘放下，汽车风驰电掣般跑着，路灯若明若暗，看不清街上的景色，也不知道是向何方驶去。下车后才知道，代表们住的是北京西苑饭店，它的门口竖着两块很大的竹排栅，上面写着“修理期间，暂不接待”八个大字。而事实上，在饭店内先后住进了1000多位代表。到了客房发现，桌上摆有一份“大会代表须知”，规定在会议期间不准与外界通电话，不准外出访亲友，不准亲友来访等。众人不禁想道：“此次会议，非同寻常！”

1月5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预备会议。当夕阳西下，暮色苍茫的时候，大会工作人员通知，按地区代表团分乘大客车赴会。几十部车分批陆续到达某宾馆集中，大家纷纷下车，由人引导步行进入了一条隧道。走过灯光不甚明亮的一条长而弯曲的隧道和一道道的闸门，不论男女老少都像夜行军一样，一个跟着一个，有时跟不上，还得跑步前进，经过颇长的一段路，代表们到达人大常委会地下室，拾级而上，才进入人民大会堂。

当时担任中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的王殊回忆出席第四届人大时的情况说：

当时还在“文革”期间，党和政府的重要会议都规定要秘密举行，代表们就连父母妻子和至亲好友也不能告知到哪里去，去做什么，只有在大会结束以后才发表公报宣布有关消息。我到北京后第三天，就由大会秘书处派车把我接到国务院招待所，而且告诉我如无紧急事情不要出门，即使有事一定要出去，也要向秘书处请假，并且由秘书处派车接送。我参加的是国务院各部门的一个小组，大约四五十人，同党中央各部门的一个小组住在同一个招待所内。代表中很多是年轻人，我几乎一个都不认识，老同志中多数是我过去熟悉、见过或



知道名字的，特别高兴的是不少老同志还是刚刚“解放”的，他们说自己是老战士、新“解放”。我们小组的组长是万里和倪志福同志。倪志福同志是工人阶级出身，在“文革”中还过得去，他去拉丁美洲访问时经过巴黎，我同他在驻法国大使馆碰到过一次；万里同志在“文革”开始后当然是跑不掉的，成了“走资派”，我同他已是很久未见了，听说他还是周总理“保”出来的，吃了不少苦，但身体还不错。

那时，正是在“四人帮”横行霸道变本加厉的时候，社会治安极度混乱，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国一片焦急和不安的气氛。代表们都很担心，到处打听国内的消息，也没有多少心思开会。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代表们在小组会上讨论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草案）》时，有人来告诉我们说，周总理患病住院，在大会上做报告时只读第一段和最后一段。很多代表在开会之前都听说周总理患病，但不清楚患的什么病，是否严重，但大家都避开不谈这件令人担心的事，只是在内心里希望他经过治疗后早日康复。这个通知使得代表们都感到总理的病情的确严重，大家心情变得非常沉重。

为了保密，13日大会开幕改在傍晚举行，而且代表们是乘坐地铁再经过地下通道进入人大会堂的。据说前一天下午的预备会议，代表们都是乘大客车到大会堂的，暴露了目标，散会时有两辆日本记者的小汽车跟在代表的大客车后面，一直跟到了招待所^①。

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向全世界宣告成立到1975年，已经整整25年多了。然而，经历了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十年内乱”，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竟然像“地下党”开会一样，真是令人感到痛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一、修改宪法；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三、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在1月13日的大会上，朱德主持会议，张春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

会前，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代周恩来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考虑到周恩来病体的承受能力，要求草拟一个3000字左右的《政府工作报告》稿。邓小平经过与“四人帮”的坚决斗争，排除种种干扰，确定了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总纲和方针。最后定稿约5000多字，

^① 王殊：《五洲风云纪》，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